

# 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

赵 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 副教授)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逐鹿中原”，意思是说，谁占据了中原谁就能统治中国。这个成语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既是一个政治活动的核心地区，同时也是文化核心地区的历史趋势。作为一种趋势，它有时强劲突显，有时也软弱黯然。但在周、秦、汉、唐、宋、明、清这几个最强盛的历史朝代里，这个趋势表现得尤为醒目。因此，它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主流现象。

中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作用的现象，无论通过文献史料还是考古资料，都可以明确地在商代辨认出来，进而可上溯到夏代。二里头文化的种种表现以及传说中有关夏人对东方的胜利，都意味着中原在当时已经很成气候了。所以，这个历史趋势的出现应该是更早的事情，而近十几年的考古学发现，提供了这段史前过程的资料。

## 一 公元前 5000 年的文化形势

近些年在南方地区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初步揭示了长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大约始于距今 12000 年前后。以后，有彭头山、皂市下层、马家浜等文化与新石器晚期的大溪文化、崧泽文化联系起来，使我们得以了解到这个稻作文化区的形成过程。但是，与之同时的华北地区的情况却不分明。

目前，我们对华北地区较早时期情况的

了解，是通过公元前 7000 ~ 前 5000 年间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后李等几个文化得到的。它们已进入旱作农业经济时期，从而在北方形成了一个旱作农业文化区。照此看来，华北旱作农业文化区的形成应当是更早一些的事。但由于目前极少有这个时期的考古资料，我们只能使用这个过程之两端的材料构成一个假说，来推测华北旱作农业文化的形成。

旧石器晚期的华北地区普遍发现了细石器遗存，这些细石器遗存的年代下限可能已进入全新世。到公元前 7000 年前后，在前面所说的几个文化里，细石器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中型磨制石器群。而同时，在北方地区的兴隆洼文化以及稍晚的赵宝沟文化中，细石器还在石器群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更晚的文化里。所以，这些地处北方地区的文化虽然年代与磁山文化相同，其文化面貌却更像联系华北旧石器晚期与磁山等文化的中间环节。这样便可以构筑一个假说，即自全新世以来，气候逐渐变暖，气候带也逐渐向北推移，原本适应华北地区干凉气候的以细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其南限也就随之向北退缩；停留在当地的人群则逐渐发展起适应温凉气候的以大中型打制及磨制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并最终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基础的黄河文化带。这个过程可能初步完成于磁山、裴李岗文化之前，但以后黄河流域农业文化北进的趋势一直没有停滞。在

这个过程中,对气候环境变迁最敏感的也许首先是人们文化中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部分,即旧有的包括打制石镞在内的细石器及其制造技术被新体系所替代,而带有习惯势力色彩的陶器,其变化过程可能滞后了一段时间。例如,在老官台、磁山、裴李岗等黄河流域早期文化中,皆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深腹罐形器,它们和流行于北方地区的筒形罐应当有渊源关系,甚至流行于北方的之字纹在裴李岗等文化中也有发现。与其说这是受北方文化因素影响所致,倒不如说它们是大北方文化普遍因素的孑遗<sup>[1]</sup>。

这样,最迟到公元前 5000 年,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形成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两个经济文化区。而在它们的外围,生产经济至多还在起步阶段(图一)。

在这两个农业经济文化区中,各考古学文化之间有了一些联系。以地理上毗邻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为例,两者的石器群种类形态相似颇多,陶器群也有其相似的一面,但磁山文化最有特色的倒靴形支座和陶盂在裴李岗文化中基本不见。这表明,两者虽然在技术层面有一定的联系,但饮食生活习惯还存在巨大差异,而风俗习惯也许更能表达人们群体心理的认同程度。

不过,这些文化之间的关系尽管松散,却也有疏密之分,如都有不少三足钵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文化之间的联系,要比它们和以厚胎深腹釜为特征的后李文化的关系密切一些。下游江淮地区尚未发现与后李同时代的文化,但在稍晚的马家浜、河姆渡文化中也有大量厚胎陶釜。故是否可以说,后李文化时期就已经为它和江淮文化建立联系打下了基础?这种文化关系在后续时代的文化格局中便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 二 公元前 5000 ~ 前 3000 年的文化形势

这一时期各地文化均有空前的发展,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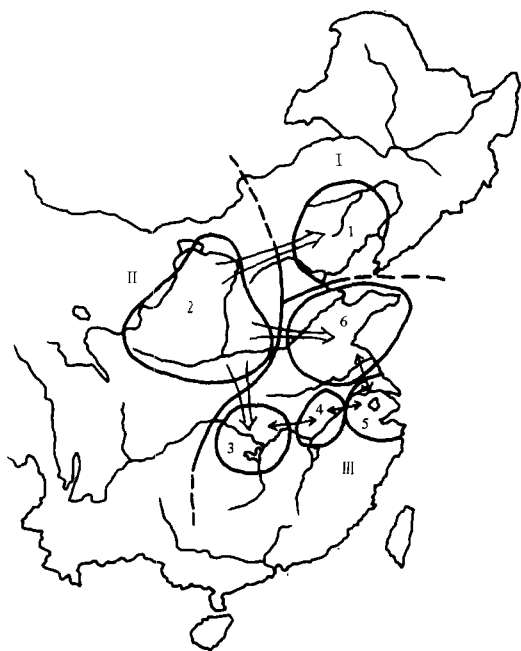
图一 公元前 5000 年前的文化形势

- 1. 兴隆洼文化 2. 磁山文化 3. 裴李岗文化
- 4. 老官台文化 5. 城背溪文化 6. 彭头山—皂市下层文化
- 7. 仙人洞遗存 8. 后李文化
- I. 旱作经济区 II. 稻作经济区

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以陶器和石器为首的制造业有了长足进步。通常会把仰韶文化的质地细腻、器形规整、烧成温度高而且图案漂亮的彩陶作为这个时期陶器制造技术的代表。其实,最早出现在大溪、崧泽文化的封闭窑室和黑、灰陶烧制技术,以及利用轮制成型技术而可能达成的批量生产的意义也不能低估。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长江流域诸文化中发展得较早且快,崧泽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存中的玉器便是当时的代表作。

农业在一些文化中已逐渐成为最基本的生活手段。目前虽然很难得出农业经济进步幅度的计量数字,但它的发展可以从聚落数量增加、面积扩大、文化堆积变得厚而长期等许多现象上体现出来,因为这些变化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图二 公元前 5000~前 3000 年的文化形势和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向

1. 赵宝沟文化 2. 仰韶文化 3. 大溪文化 4. 薛家岗—北阴阳营文化 5. 崧泽文化 6. 大汶口文化  
I. 筒形罐文化圈 II. 彩陶文化圈 III. 鼎文化圈

这一时期很多地区都出现了环壕聚落,它意味着安定持久的生活以及氏族社会的稳定。而前述聚落面积扩大、聚落分布密度增加等现象,又意味着人口的大幅度增殖和集团规模的扩大。这些变化又进一步导致了两个有关联的文化倾向。

首先是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扩大了,内部联系加强了。汇合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文化而来的仰韶文化,在分布范围上远远超过了前三个文化的总和;从公元前 5000 年起,仰韶文化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来的内部统一性不断增强,到庙底沟期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黄河下游。后李文化之后,经北辛文化过渡而来的大汶口文化在将胶东半岛土著文化混一的同时,也逐渐把地域拓展到西至豫东、南越淮河的广大区域。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文化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

其次是考古学文化之间交流的繁荣。文化的扩展使更多的人团结在一起,也使得文化与文化变成了近邻,这时,彼此间的联系也就变得密切起来。与此同时,在前一阶段文化之间联系上的微妙不平衡也持续加大,一些文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而形成了几个大的文化群,如严文明概括的彩陶文化圈、鼎文化圈和筒形罐文化圈<sup>[2]</sup>。吉德伟对前两个文化圈的特征与区别有过很好的描述<sup>[3]</sup>,只不过他把它们称作“东、西方文化”。吉德伟在文章里没有涉及东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圈。其实那里的情况也是类似,而且它形成的时间比其他两个还要早(图二)。

这种文化群的形成与它们各自不同的经济基础有关。但是,以物质文化面貌为标准划分出来的集团格局与经济类型的分布不完全一致。对此,也许可以借用苏联考古学的两个概念来表达这种关系,那就是“共同经济类型”和“历史文化区”。这种现象意味着人们之间的联系不仅建立在相同的经济生活上,还应当有思想的乃至政治方面的内容。

文化交流还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文化群之间。如具有仰韶文化风格的彩陶也出现于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中,类似大溪文化的白陶普遍出于南中国的广大地域。不过,仔细比较三个文化圈之间的交流情况可以看出,仰韶文化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似乎更为主动和强有力。一方面是它的彩陶风格影响甚广,另一方面,鼎文化圈中的封窑烧陶技术和产品、发达的磨制石器技术和玉器都还没有影响到仰韶文化中来。至于仰韶文化和筒形罐文化圈的关系,就更像是一边倒了。

仰韶文化之所以成为主动的一方,同它本身强大的实力有关。最近,笔者有机会在河南灵宝进行调查。当地已发现史前遗址 120 多处,据初步统计,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堆积有 70 多处,其中有三四处遗址的面积达 50 万平方米左右,北阳平遗址面积更是达到 100

多万平方米,其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规模之大皆令人惊讶。而且一些迹象表明,灵宝还不是仰韶文化最中心的地区,由此不难理解仰韶文化何以在对外关系上取得优势了。

如果不能全部归功于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话,它至少也是导致下个时期文化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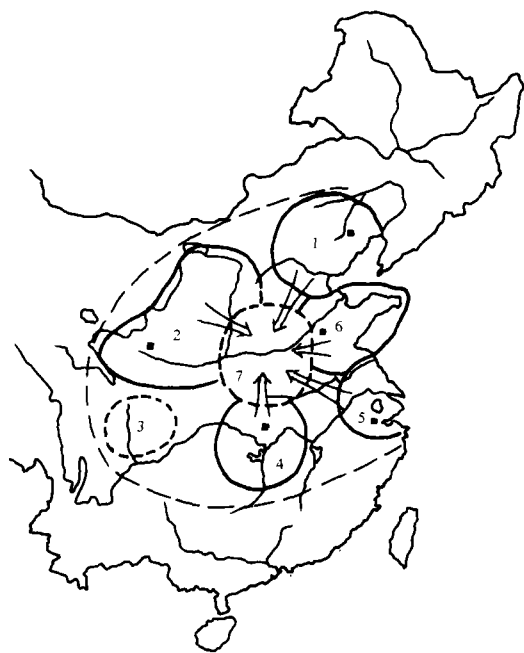
### 三 公元前 3000 ~ 前 2500 年的文化形势

经过前面那场大范围的文化交流后,涌现出一批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如具有大型宗教遗址和贵族墓地的红山文化,以大型聚落遗址、贵族墓地和发达的攻玉技术为特征的良渚文化,建造了超大型城址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仰韶文化大地湾遗址的宫殿式建筑等。为了强调这些文化的成就,我们用“文明”一词来称呼它们。由于它们所处的时代,可以把它们叫做“史前文明”;又由于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可以把它们叫做“地方文明”。

时间上的前承后续使我们相信,那场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地方文明的崛起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这一点在有关红山文化的讨论中已被指出<sup>[4]</sup>。良渚文化的崛起也是建立在用鼎文化区内部广泛交流的基础之上。只是要彻底搞清这种文化交流在何种机制上发挥作用,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比较这些地方文明不难发现,它们都达到相当高的成就,但在文化表现上却各有千秋,暗示其各自的社会发展方式有一定差别。以良渚文化为例,它的成长迅速而短暂,很快便达到高峰。在这个突起阶段,良渚文化似乎主要是自我封闭式的发展,与此前阶段开放式的对外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到了文化的峰值期,它开始对外扩张,同时有很多引人注目的特点,如它是一个组织化程序颇高的社会,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社会中存

在大量非生产性劳动支出,享乐型的社会生活等等。良渚文化的衰落也同样突兀,我曾经推测,这主要是由于良渚社会内部的调节机制彻底失效所致<sup>[5]</sup>。良渚文化的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在这一点上,与之最相似的非红山文化莫属。然而两者的经济生活全然不同,前者的稻作农业显然不适合后者所在的东北地区,遗迹遗物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思想内容也有很大差别。若将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作一比较,也可以看出,宗教在后者的社会生活中明显没有前者那样煊赫。良渚文化有小规模墓地和分散居住的聚落,又和大汶口文化中带有大规模公共墓地的村落不同,这意味着两者在社会组织方面的差异。这些高度发达的文化其命运也不尽相同。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衰落得比较早,身后留下了一段时间颇长的苍白;屈家岭文化过渡为



图三 公元前 3000 ~ 前 2500 年的文化形势

1. 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牛河梁遗址群位置)
2. 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大地湾遗址位置)
3. 四川盆地新石器文化
4. 屈家岭—石家河早期文化(石家河遗址群位置)
5. 良渚文化(良渚遗址群位置)
6. 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遗址位置)
7. 中原文化区开始出现

石家河文化之后,也在与中原文化的折冲中改变了方向;只有大汶口文化的后续者有能力与中原文化对峙较长时间。

这些地方文明在发展、强大的同时均不同程度地对外扩张,这一点在大汶口、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良渚等文化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此时,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北进到今河南南阳一带,而这里曾经是庙底沟时期仰韶文化的范围;东面的大汶口文化比较早就已占据了豫东平原;良渚文化在它的繁盛期曾一度北上,直抵苏北连云港一带。但同期的仰韶文化却显得比较衰弱。一方面,在前一个时期里文化面貌十分统一的情形消失了,各地的地方特色突出起来,至少就文化面貌而言,进入一种离析状态;另一方面,即便是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区,也开始出现来自其他文化的因素。此外,在仰韶文化除最西部的地区以外,也始终没有发现能和良渚、石家河等文化相媲美的遗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原地区处在一种空虚状态。由于中原文化和周围几个地方文明实力对比的差距,大约从公元前 3000 年开始,文化之间的交流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早先主要是仰韶文化对外施加影响,这时则变成由各个地方文明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原文化区开始形成的时期(图三)。

从更大范围的观察可以看出,前面说到的那些地方文明都处在中原文化区的周边地带,它们几乎在相同的时间里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并在有个性地发展的同时,彼此间保持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巨大的文化丛体<sup>[6]</sup>。所以,严文明在描述这种现象时,认为中国文明的发生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简称“多元一体”<sup>[7]</sup>。

在这个文化丛体的更外围地区,例如东北、蒙古草原到西北戈壁、华南地区,其文化发展显然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这些地区要

么不便发展农业,要么就是没有主动发展农业的必要。而且,前面提到的那些地方文明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对外方向是中原地区,所以,这些更外围地区的文化在当时处在一种缺少刺激、发展停滞的状态。以岭南地区为例,大溪文化时期,由于北面的仰韶文化十分强大,不但遏制大溪文化向北发展,也间接促成它掉转方向而对岭南渗透。结果,我们在深圳、香港地区都能看到具有大溪风格的白陶和彩陶。而进入屈家岭文化以后,长江中游的文化势力大幅度向北扩张。恰值这个时期,岭南地区文化是最说不清楚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当地的考古工作尚不到家,还没有发现;更大的可能是,这时的岭南由于缺少外来刺激,文化发展停滞,所以文化面貌也进入极其缓慢变化的阶段,以至于我们很难在已有的发现中把它们识别出来。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新石器文化清楚地呈现出三重结构。

#### 四 公元前 2500 年以来的文化形势

中原地区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在此之前就已开始,这个趋势到公元前 2500 年以后变得愈发明显。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一反单纯的样态,混合进来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变得复杂而丰富起来。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如下:

第一,中原文化新出现的陶器种类不下十几种之多,如鼎、豆、单把杯、高柄杯、觚、鬲、甗、盃、鬻、罍和彩绘陶器等。其中有的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有关,有的是受大汶口文化影响,还有的可以追溯到长城地带的北方。另如前述,快轮制陶和闭窑烧制陶器技术的发明也显然在用鼎文化区中先行了一步。

第二,石器制作技术有了飞跃性发展,其中不少是来自东、南方的因素。例如,石镞的镞体从扁平到立体的变化,至今在中原地区没有发现其中间环节,而长江流域的文化中,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此外尚不清楚玉器是怎么传入中原的,但良渚文化中的琮、璧、璜之类既然见于西北边陲的陕西神木遗存和齐家文化中,我们便有理由认为,当时的中原也会有这类东西,何况尧伐三苗的一个主要口实就是“苗民弗用灵”。

第三,中原地区出现连间式建筑是在仰韶文化晚期,首见于大河村遗址,但鄂北豫南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期便已流行这种建筑了。我还推测,这种建筑样式可能与长江流域的干栏式建筑有关。

第四,在中原地区,目前仅在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见到厚葬的习俗,以及用随葬品和葬具、墓葬规模、墓葬在墓地中的位置等来表现被葬者的身份、地位。而在屈家岭文化、崧泽晚期至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花厅期和红山文化这一连串的周边文化里,它们已经很明确地存在着了。其中,对中原文化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大汶口文化。

第五,在周缘文化中发现的刻划字符,极有可能对日后中原文字系统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龙和其他动物造型,以及琮、璧之类玉器所体现的精神信仰,也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原文化及其后续者所继承。

伴随文化面貌的复杂和繁荣,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可以从考古学角度与其他地区分别开的文化实体——中原龙山文化。而且,在和周围文化的折冲中,中原龙山文化的实力不断增强,渐得优势,这一点可以从中原龙山文化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反映出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此时已经衰亡。曾经被石家河文化占据的豫南地区重又回到中原文化的势力范围;石家河的巨大城址在文化后期也走向衰败,城址上却出现了以瓮棺墓地为首的大量中原文化因素。东面的龙山文化依然强大,但在它的西翼出现了一个文化面貌更接近中原文化的地方类型——造律台类型,可知它也被大大地削弱了。

发生在中央地区的变化也波及到外层。在江浙地区,在良渚文化衰落的同时,浙南山地却出现了良渚风格的较大规模墓地,墓地中还发现类似闽中昙石山文化的拍印纹陶器。耐人寻味的是,类似昙石山文化的遗存在粤东地区有广泛分布,甚而达到珠江三角洲口岸,而处于这个范围内的广东海丰发现了良渚式玉琮。在另外一个方向,粤北出现了石峡文化。从各方面来看,石峡文化在粤北都是一支外来文化,与它面貌最接近的是赣江平原的樊城堆文化。我以为,与其把它们视为两个考古学文化,不如看作一个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更恰当一些。而在石峡遗址中也出土了良渚式玉琮。如果将昙石山和樊城堆两个文化向岭南的扩张联系起来,进而把这一现象置于更大的背景环境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与整个文化格局的变化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中原文化的崛起建立在广泛吸收周邻文化的基础上。如果把中原文化的外来因素分出层次的话,越是来自远方或者年代上有一段距离的文化因素,在中原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越是显赫。前者如玉器、象牙器、宝贝等,一进入中原,便都成了上层社会的专用品;后者最典型的例子莫如鼎,这种原产于东方的陶器滥觞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并成为龙山时代中原居民最主要的炊器,而同时,在它的原产地山东和长江流域,鼎却趋向末路,它反而被中原地区保存下来。到了二里头文化,鼎在诸器中越来越凸显出来。《左传》宣公三年记:“昔夏之方有德,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史记·孝武本纪》也说:“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指的就是这件事。在二里岗文化中,一方面,鼎作为大众炊器的功能几乎完全被鬲所替代,另一方面却成为青铜器中最主要的种类。其实,标示社会成员等级地位的礼器,其绝大部分并非中原土产。关于这一点,李济早在60年代初就指出,殷墟青铜器的形制皆

脱胎于陶器,而它们“绝非重复当时陶器的形制。它们显然是主要位于沿海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陶器的模仿品”<sup>[8]</sup>。可见,中原的上层统治者对于远方的和传统的东西持有尊重态度,并把它们看成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

这种“礼失而求诸中国”的现象意味着,文化交流不仅仅在技术、贸易等经济层面上展开,它更主要是在思想、制度、政治以及统治权术的层次上进行的。

这一点也似乎有助于说明,中原文化强盛起来的原因,也就是那些曾盛极一时的地方文明衰退消亡的原因。所谓中原,是天下居中、八方辐辏之地。在史前文明的丛体里,它是物流、情报、信息网络的中心。这个地理位置方便当地人广泛吸收各地文化的成败经验,体会出同异族打交道的策略心得,终至后来居上。张光直认为,商代城市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建设起来的<sup>[9]</sup>。我们可以把这个认识再引申得远一点,那就是,中原文化的强大主要依赖于政治、经验的成熟,而不是因为它在经济实力上占有多么大的优势。反之,前一个时期的那些地方文明由于处在这个网络的边缘,信息来源狭隘,从而导致了它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社会运作方向的偏斜,最终在和中原文化的对峙中渐落下风,有的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原文化直接对峙就先行衰落下去了。

因此,中原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凸显出来,不仅为以后三代文明准备好了地域舞台,还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多重空间结构。在这个格局大势中,中原兼收并蓄各方好的东西,为我

所用,它有包容、同化和改造一切外来因素的大度心理,也因此得到其外围群体的认同。所以,中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与日俱增,辐射四方,这在人们的思想乃至心理等方面留下深刻烙印(譬如外服制度、“中国”的观念等),也决定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行为的基本方策。而这个贯彻了几千年的持续而有力的历史趋势,便肇始于公元前3000~前2500年之间。

- [1] 赵辉《中国北方的史前石镞》,《国学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2] 严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系统说——兼论赤峰地区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 [3] 吉德伟《考古学与思想状态——中国的创建》,《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
- [4]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
- [5] 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中国良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1996年(待刊)。
- [6]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 [7]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 [8] 李济《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1962年;《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1968年。以上两篇皆见《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 [9]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经联出版社(台湾),1983年。

(责任编辑:郑 彤)

##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oward the Centricity of Central Plains

Zhao Hui

The Central Plains was China's political center and cultural nucleus as well in history. The author takes an archaeological look at the Chinese society from 5000 to 2500 years BC, and analyses the rise and fall of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He then inquires into the growth of the Central Plains into China's center, a process that began, as he believes, somewhere between 3000 and 2500 years BC.